

公民·视点 吴泓洲

水库洗脚



桃曲坡水库位于陕西省铜川市,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城市供水、防洪等作用的水库。

最近一名微博名为“MOMO136”的女网友,不仅在禁止戏水的桃曲坡水库边洗脚,还配发洗脚照推出了一条微博:“铜川人民是否都能喝到我的洗脚水?”

把脚伸入水库里便联想到“市民喝洗脚水”,就跟水库里砸个蛋“市民喝上蛋花汤”一样,很可笑。

但这看起来“很可笑”的事还是发酵了,最终成了网络热点,不仅当事人删除微博,更改了头像,相关部门也已着手调查。

有人说“水库洗脚”不过是一个玩笑,大可不必众人拍砖、小题大做。

其实,这要看是怎样的“小题”,又如何“大做”?

如果是私人领域范畴的事情,比如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洗脚,自然不在公众的舆论视野之内,但此事显然涉及到了公共领域的话题——水源地与该城市每个市民都息息相关。况且这座水库平时都被严禁触水而戏,就算有人违规玩水,也逃避遮掩;而该网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与其说是她的“无知无畏”,倒不如讲是对公序良俗的蔑视与挑衅。

因此,此事是无伤大雅的“小题”,却也是戳中公德怒点的“大题”,应该“大做”。

但有人开始人肉该网友,想把她曝露于公众之前。这就值得警惕了。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打着道德的旗号,做出非道德的事情。

暴雨守井



顶着瓢泼大雨,用身体夹住一百多斤重的下水井盖,站了两个多小时……近期,一名红衣女工“意外”地成了“冰城”哈尔滨的“网红”。

她叫苟笑红,是哈尔滨排水集团顾乡排水公司一工段段长,女子清掏班班长。突然变成了“网红”,让苟笑红有些“猝不及防”。“雨天就是号令,下雨排水对我来说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作,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嘛!没啥。”

苟笑红说,当天的那场雨太大了,照片里是三区汇水的低洼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积水点。这种井盖每个有150斤重。“井盖一旦打开就不能合上,我得站那儿守着。一是怕井盖被积水打翻,二是为了避免给车辆和行人带来麻烦。我穿的红衣服明显,给他们当个标志……”

从中午集结,到结束工作回家,苟笑红那日在积水里一共忙了8个多小时。

她觉得这次走红就像一次“意外”,而这个“意外”,却温暖了大雨中许多哈尔滨市民的心。有网友留言说,“她是暴雨中坚守的莲花,带给人们温暖守望的力量。”

“以前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更不愿意和我们这些人打交道,甚至看见我们工作都绕着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真正了解我们的工作。”苟笑红觉得,网友说她的目光“温暖了这座城市”,而这么多人的目光停留在排水工身上,同样也温暖了这个群体。

公民·人物

“只要有病人,我就不会离开麻风村!”

刘浩军 刘学武

在江西省永丰县三坊乡邱坊村的大山深处,有一个令人畏避而远之的村落——麻风村。有一位64岁的老人,在麻风村默默守护了19年。19年中,他与麻风病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始终做到了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如亲人般地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用大爱温暖了麻风村这个大家庭。

这位老人,就是永丰县皮肤病医院麻风村管理员张文瑞。1997年,45岁的张文瑞应聘来到麻风村从事管理工作。手脚溃烂、肌肉萎缩、面部瘫痪、鼻梁塌陷、眼珠突出……刚到麻风村,眼前的一切,让张文瑞十分吃惊。

走出病人的房间,张文瑞再也抵制不住,跑进村后的山林里,剧烈地呕吐起来,将胃里的食物吐个精光。

接下来的几天,麻风村的一个个画面让张文瑞挥之不去,端着饭碗更是难以下咽。

编者按:从2003年深圳通过国内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到2015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再到2016年5月,中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器官移植手术不再受交通拥堵、部门协调而延误,中国的器官捐献十数年“磨一剑”。这是一项连接生死的事,对于不幸离世的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得以在他人身上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则重获新生。本期,我们带你走进中国器官捐献10多年成长的“爱与痛”,走进器官捐献协调员内心的“欢与累”。

本报记者 李丹青

自今年5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以来,包括成都、武汉、昆明等在内的多地出现了通过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进行器官捐献案例。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终于不再受交通拥堵、部门协调而延误了。但街头采访中,市民仍然有困惑:“既然器官捐献无偿,为什么移植却很贵?”

带着这个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一些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为记者带来了器官捐献10多年成长中的“爱与痛”。

器官捐献迎来春天

2012年3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健康处处长侯峰忠签署了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那时,中国的器官捐献还处于试点阶段,器官登记还只能手写。

2016年4月,刚刚上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的他,在入职后的隔天,就再次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不同的是,这次是在电脑的信息登记系统上,而中国的器官捐献也已推广至全国28个省市。

两次填写捐献登记表,侯峰忠的心境完全不同。第一次器官登记是在一场活动现场,更多是出于工作原因。2016年的这次,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的。因为调研时,他目睹了太多等待肾移植的患者求生的渴望,也会体过捐献家庭的“重生”。

在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起步于

本报记者 李丹青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移植随访门诊见到王璐时,她正在不停歇地接待病人。除了常年出诊,随访近五百例患者外,34岁的王璐还有一个神秘又特殊的身份——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2年,在佑安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当了7年内科医生的王璐,开始接触器官捐献的工作,并于2013年底取得协调员的资质证书,正式成为一名“看着死亡,却又陪着新生”的生命接力员。

兼职从事协调员的这5年,因为随时可



2010年3月,当年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仅34例。5年后,国家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达2766例,器官移植数量超历史纪录。自2003年深圳通过国内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至今,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10余年间,不论是政策法规、管理机构还是一线

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尴尬”的职业 看着死亡,惦着新生

能出发,王璐养成了随身携带资质证件的习惯,因为见多了生死,她变得爱哭、爱笑、爱激动。5年间,她奔走在北京各大医院,参与了佑安医院每一例器官捐献,也在委屈与欣慰中,感同身受捐献者家庭的绝望与善良。

至今,王璐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出现在患者家属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场景。2013年,当她得知一名30多岁的女性已经脑死亡时,立即赶到医院,询问她的丈夫愿不愿意了解器官捐献方面的政策。对方非但不听,还不停地怀疑并责骂她。已经习惯了医生身份的王璐,没想到自己会被骂成这样,哭着从医院跑了出去。“但过后换位思

考,家属肯定比自己更难过。”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王璐也渐渐产生了“免疫”的能力。王璐曾统计过,2015年,她一共“跑出去”130多次,最后只成功了15例。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捐赠和接受器官的双方均须完全遵循“生命自主,绝对自愿”的原则。在跟家属沟通时,王璐从不会去劝说或诱导对方进行捐献,对方一旦表达“不感兴趣”的想法,她就立马撤退。

即便是协议书已经签好,受捐者已通过电脑排序正在等待移植的机会,甚至是医院已为被捐者花费高昂的诊疗费用,只要家属犹豫,王璐都会立即喊停。这种情

况,仅2016年,她就碰到了3例。“如果让病人和家属,稍微带有一丝遗憾去捐献,都会给这个家庭留下阴影。”

但在王璐看来,协调员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家属的拒绝和犹豫,而恰恰是他们的奉献与善良。不久前,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北京突发车祸,脑出血。她的父母是来京务工人员,平时靠卖水果为生,车祸后治疗的钱都是靠老师和同学捐赠的,眼看着孩子的生命走向尽头,父母提出要捐献器官回报社会。王璐和医院器官捐献团队的其他5名协调员一起把小女孩转移到佑安医院。

“老张对我们不离不弃,忘我付出,使我们倍感温暖。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些年来他对我很好,很照顾,老张就是我的兄弟,是个好人啊!”杨新根感慨地说。如今麻风病已被完全攻克,这里就是最后的“麻风村”,也是终将逝去的村落。虽然张文瑞只是医院聘用的一名临时工,现在月工资只有300元,但皮肤病医院将村里的部分耕地给他家耕种,不愁吃穿。“我不为钱多钱少,为的是病人需要我。只要有病人,我就不会离开麻风村!”

劳动、蚊虫叮咬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麻风病。“我都照顾这些患者19年了,不是也没被传染吗?”

因为麻风病可控可治,麻风村从最多时的140多名病人,逐年减少到目前的1名病人。70岁的老人杨新根,就是麻风村的最后一位病人。老杨麻风病已痊愈,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脚踝处皮肤溃烂,肌肉萎缩,行走艰难,一直依靠张文瑞护理。

“老张对我们不离不弃,忘我付出,使我们倍感温暖。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些年来他对我很好,很照顾,老张就是我的兄弟,是个好人啊!”杨新根感慨地说。

如今麻风病已被完全攻克,这里就是最后的“麻风村”,也是终将逝去的村落。虽然张文瑞只是医院聘用的一名临时工,现在月工资只有300元,但皮肤病医院将村里的部分耕地给他家耕种,不愁吃穿。“我不为钱多钱少,为的是病人需要我。只要有病人,我就不会离开麻风村!”

个省市虽未成立专门机构,但在红十字会内部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办公室。

2010年,当时的卫生部和红十字总会共同启动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便应运而生。经过5年的培训与考核,截至2015年底,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至1513人。“同时,我们还组建了一只数千人的志愿者队伍,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侯峰忠补充道。

成长的烦恼

目前,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但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而仅有约1万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比为1:30,和一些发达国家的1:3相差甚远,远远不能满足移植手术的需求。

捐献率较低的现状,在侯峰忠看来,主要原因并非传统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困扰,而是我国器官捐献起步晚、宣传力度小,导致公众对此的认知度太低。从事器官捐献这些年,让他最慰藉的是,当他向周围很多人开始对此全不知情的人介绍了之后,大多数人对器官捐献表示认可并愿意支持、付出行动。

今年5月6日,卫计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希望通过设立24小时应急电话等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机制,提高转运效率。在侯峰忠看来,这表明各部门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及支持力度的增加,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工作的庞杂。“光一个绿色通道就涉及到六部委,说明器官捐献涉及的部门实在太多。”侯峰忠曾梳理过,实际相关的部门包括民政、公安、财政、交通等,多达十四、五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多少有些力度不够。

以医疗和殡葬为例,器官捐献者往往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但国家财政的救助却远远不够,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案例有1699例,但国家仅拨付了84万元。同时,捐献者为社会做贡献之后,在享受殡葬优惠上,国家民政部门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

最让侯峰忠头疼的,还是奋斗在一线的协调员的保障问题。“我每天都跟打仗一样。”2015年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告诉记者,当别人即将失去亲人时,他们还要上前询问愿不愿意器官捐献,不论成功与否,都对协调员的心理打击太大。“他们的工作说半夜去就得半夜去,说

到偏远的山里,也得去,一刻都不能耽误,这无形中增加了工作和精神压力。”侯峰忠无奈道,当前对协调员的经济、人身和心理保障都存在不足的地方。

还需制度保障

王璐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拍一部“一个器官的旅程”的公益宣传片,讲述一个器官是怎么从供体身上,经过多少道严苛的判定、手续,又是如何保存、转运,飞快地到达受体那儿,把那个人救活。透过短片,人们能体会逝去的患者及家庭是怎么样的,又能看到被救活的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王璐的这个想法,与侯峰忠不谋而合。“公民器官捐献意识的唤醒,对推动器官捐献工作非常重要。”侯峰忠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会有计划地扩大宣传,将公益片片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进而支持并愿意做出捐献。“捐献的人多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就会降低,受捐者则能以更低的移植费用得到器官。”

仅有宣传还远远不够,侯峰忠认为,对于器官捐献这样一个联系生与死的神圣事业而言,必须有更加完善的法规与制度设计保障,才能让捐献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

在他看来,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捐献的法律规定较少且不够明确,对卫生主管部门和红十字会职责边界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这导致很多基层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在工作中找不到法律依据,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实际上,涉及到器官捐献,一直有一个疑问盘亘在很多人心里:“器官捐献无偿,为什么移植却很贵?”

王璐解释,这主要是器官的获取和管理费用,具体包括捐献者的住院费、手术费、器官保存费、医生劳务费、交通费及家属的住宿费用等。

以捐献者的住院费为例,在器官的获取过程中,当器官协调员介入,将捐献者转入医院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后,医院要对其进行传染病筛查、血液检查、心脏超声、肝脏超声等20余项检查,再加上住院费等,费用一般在3万元至10万元不等。随后,再进入费用在1万元左右的手术环节。

侯峰忠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医疗保障与服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让捐受双方都不会因为医疗费用而对捐赠和移植产生迟疑。对很多捐献者家庭来说,伴随亲人离去,家庭破碎的,还有一大笔救治费用,移植一方亦如此。“如果保障体系健全的话,就不存在这个后顾之忧。”

安全月引导职工上网“讲规矩”

本报讯 沈铁吉林车辆段以6月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深入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引导职工文明上网“讲规矩”。

这个段针对新媒体特点广泛开展互联网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组织全段干部职工学习互联网及手机保密安全案例,开展一次全段性网络安全普查,营造健康清新的安全生产软环境。同时,注重发挥新媒体作用,利用职工中的先进典型引导人,职场中的新闻速递吸引人,用丰富多彩线上线下互动留住人,让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孙红玉 吕晶)

阳原地税打造“小微成长阶梯”

本报讯 河北阳原县地税局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微”解困,打造“小微成长阶梯”。今年截至5月底,该局已为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合计减免税款16.61万元。

该局创新实施“互联网+纳税服务”行动计划

该局创新实施“互联网+纳税服务”行动计划,充分运用纳税服务宣传、QQ群、微信群、微博、手机APP等载体广泛宣传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即时传递最新税收政策及解读,实时在线解答小微企业纳税人在预缴申报时出现的问题,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王晓娟)

宁波港航协同共建“红色港湾”

本报讯 近日,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宁波穿山边检验站、中远海运集运宁波分部共同签署《齐心共建红色港湾 携手助力海上丝路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在船舶和船员管理工作中携手。

深化宁波共建模式,发挥港航协同效应,是在港航间建立交流合作的一次探索实践。此后,通过统筹谋划、合力推进,双方将在“红色港湾”党建服务品牌的创新实践、宣传推广、进一步发挥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合作。警地双方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勇于创新,不断开创创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局面。(姚兴)

阿克苏车务段功夫下在服务上

本报讯 乌铁阿克苏车务段功夫下在服务上,今年前5个月,该段发送旅客较去去年同期增长29%,实现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6%。

该段通过实施创新服务、主动出击和精准营销策略,获得了大量信息。最近,该段阿克苏车务段党支部书记高岗、站长张广红从阿拉尔电视台一位记者处得知,某单位今年6月有个100多人的自助旅游团队,他们主动与这个旅游组织单位取得联系,很快完成了首批123张团体票的上门发售工作。截至6月10日,阿克苏车务段今年已办理团体票18批601人,创收99023.5元。(张林燕)